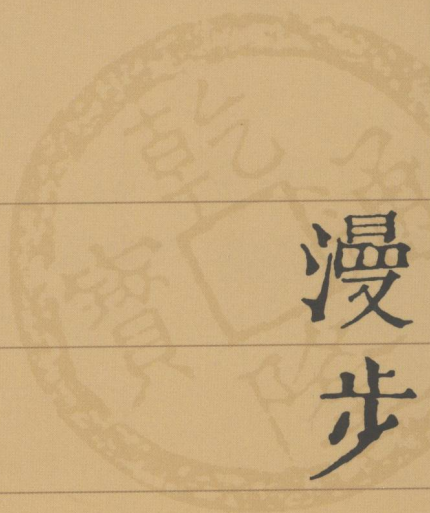


泉学

漫步



戴建兵 王昭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泉学 漫步



戴建兵 王晓岚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学漫步/戴建兵,王晓岚著,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

ISBN 7-5434-4941-2

I.泉... II.①戴...②王... III.①货币-经济史-中国②信托-经济史-中国-近代 IV.①F822.9
②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260 号

泉学漫步

戴建兵 王晓岚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2.25 印张 310 千字
2002 年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434-4941-2/F·20 定价: 20.00 元

视 角(代序)

十几年来,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领域,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史学视角和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番探讨。

一、历史学的领域

历史研究正在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即过去传统的那种历史研究从整体上来看越来越少了;那种动不动就会在一个问题上形成争论的局面基本上不再出现了。同时历史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过去历史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和军事,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应从一个社会的经济变迁中去寻找其终极原因这一句历史唯物主义的箴言,并没有使我们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甚至近代百余年的历史研究产生真正的效力。虽然我们已经渡过了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公式放在前面,然后找一些材料当题解的“苏联模式”的时代,但真正从经济角度探索社会的变革、探索政治变革的力作还极为罕见,究其原因,经济史自身研究的缺乏是其重要原因,而经济通史或宏观经济史^{*}研究的基础——部门经济或微观经济史的短缺,又是经济史研究深入下去的障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和我们使用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有着极大的关系,传统模式从政治到政治,或着是从政治到军事,从军事到政治,再从政治到文化。而经济,社会经济的变动只不过成了论文或者专著中所必要的点缀,历史是如何从经济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从经济到军事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并没有得以确立。

对于经济史而言,许多从事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只是对宏观的经济史有一定的了解,而中国的宏观经济史的研究又是建立在没有或着只有少数的部门经济史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没有部门经济史而写出来的宏观经济史不能不说其没有意义,但是在没有部门经济这一构成经济细胞的基本要素进行研究而搞出来的经济史,到底能对于我们的历史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因而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而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又莫过于对于中国部门经济史的研究,历史研究需要的是一些在专史的基础上构成的通史。

二、条块问题

传统的历史研究和教学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人们往往搞一个时代的历史,而学习也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进行的,这很像我们现在部门管理中看到的“块块”。而从古至今的部门史则构成了“条条”。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的历史研究需要在这些“块块”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历史的“条条”,也就是一种行业、或着一个部门经济从头到尾的专史,这种历史研究更有时代特色,也更有生命力。

从社会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分工决定着很多社会的变化。就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历史图书的需要来看,一个部门史的专著的需要量,要大大超过对于一个断代史专著的需要量,而且,只有进行这种条条的历史研究,才能使社会历史的研究深入,同时,对历史“条条”的研究,也更能通过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而发现其规律,这更符合历史研究的本旨,历史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人类的未来,历史怎么才能为现实服务,对于断代史而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对

于从事于“条条”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因为是从古到今的所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进行涉及,因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可以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所言的“历史无用论”破产。

对历史“条条”进行研究,可以获得现实社会的经济支持,因为“条条”的一端就是现实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从中国钱币学的兴盛获得一定的认识。80年代初,中国的钱币学还是一门“绝学”,但是由于其依托银行部门的经济支持和社会收藏界的市场支撑,现在不论其研究水平还是学科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刊物之多,发行量之大,是历史学专业刊物无法相比的。

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块块”的意思,而且对于历史本身而言,他们就是一体,从“条条”看“块块”,“块块”是平面,而有“条条”的支撑,“块块”才会更丰满,更有深度,才更有力于我们历史的研究。只不过从现在我们历史学界总的情况来看,应当重视引导对于条条的研究。

三、部门经济史

历史的社会功能是使人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减少失误、指导未来。由于人类历史是综合、完整的社会变迁历程,因而反映人类社会分工的部门经济史不仅是反映社会发展通史的基础,且更是当今时代对历史研究的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对中国近现代部门经济史的研究,因为部门经济史的缺乏,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经济的盲目,对于过去经济历史的忽视,使我们正在浪费前人的经验。

前一个时期,谈起股票、证券、信托、合资企业……,许多报刊文章,甚至书籍,竟大言其为“新生事物”,要从西方国家经济理论库里“译”取武器,然后在中华大地上加以实践,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悲剧。

自从1840年中国开始迈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社会经济就在主权沦丧的前提下步入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方式及现代部门经济开始楔入中国经济并对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破坏下得以发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殖民化程度较深的通都大埠,这种情况则更为明显。

当然中国近代经济是在没有民族独立的状态下发展的,因而有其种种颓势、且自身发展也多有畸态,但我们不能否认现代部门经济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础上的建立确有其一定的自我发展规律,且有一定的“路径”可寻,特别是一些新的部门经济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发生及成长的历程更是如此。

具体而言,中国近代部门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比如中国近代信托业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和信托业务不分,无信托立法,人们缺乏信托意识,国家资本对民族资本信托业的冲击……有些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托业几起几落的教训如出一辙,如果早一点进行中国近代信托史的研究,行政管理部门重视一下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将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经济史是历史和经济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其研究的不力,将影响我国经济和历史科学自身的发展。

对于历史学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个薄弱学科,而部门经济史的成果则更为少见,以部门经济规律为指导研究其发展的部门经济史则更为罕见,这对于历史学界是一种缺憾,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象司马迁一样,在没有部门史的情况下就可以写出传世的通史,当今时代复杂的社会和社会分工,已经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没有对中国近现代部门经济史的研究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贫乏,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自己的经济历史活生生的社会经济实践中产生出来,单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去

译取,而轻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对西方经济文化如何在中华文化的氛围中发生、成长的命题弃而不论,有只知希腊不知中国之嫌。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开药方,从而使大量文章成为“新闻”类作品,时效性强,存活率差。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展望未来,在这个基础上指导现实的实践才能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学问实践的历程。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竟然是两位美国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

一种部门经济,特别是一种新的在传统社会中还未成长起来的部门经济,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其不同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及部门经济自身的发生和发展均有其独特的作用和规律,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绝不会长出和美国底特律一模一样的汽车城,那怕是“硬件”相象,但其“软件”也会受中国文化的制约而发生变异。如何减少部门经济发展中的失误,使西方真正有益于经济发展的部门经济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催生和成长。对中国近代部门经济史的研究、对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的部门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加快我国部门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使引进先进经验更为适度及与本国文化迅速交融方面大有益处,其远期效果将是使部门经济的发展合理化并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

对于史家学而言,部门经济是史学为现实服务,并根本消除史学无用谬论的一种新的思路。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不要把中国经济史仅当成一种点缀,而真正能让新的经济观念和实

践在中国文化中成长和融会。

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要特别注重于部门经济史的探索;注重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同一部门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注重于不同文化中部门经济运行的规律;注重于政府经济政策对部门经济的利弊分析。它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决策部门的施政,有助于经济立法的发展,有助于有中国特色、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早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四、“杂交”优势和新思维

生物学中有“杂交优势”之说。

而我们所说的“条条”都必然与其它学科交叉，现在，历史学应该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最起码来说，对于交叉学科的研究，可以扩大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例如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陶瓷工业方面的论文，发表在陶瓷专业或史学刊物上都不足为怪。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市场”，易于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

我们从现在西方史学界当中比较占优势、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史学流派来看，大多也是一种交叉的史学研究，例如家庭史学派，也就是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小组从事的研究。这个在70年代崛起的西方史学流派，在欧洲有一定的势力。该学派以13-18世纪西欧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其研究的重心，探讨家庭结构的模式、家庭土地的继承权、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以及家庭式生产对欧洲近代化起到的作用等等，最后导出欧洲社会在前工业化时期有一种家庭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但更有持久性。

本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以华莱士·多纳姆和N.格拉等人创始的企业史学派，二战后开始发展，60年代起，以哈佛企业史中心为代表的企业史学派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们在研究中，重视对企业宏观的研究，充分利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各个领域的成果和方法，深入研究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发展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因而成效显著。

60年代美国出现的新城市史学也是交叉史学，并对美国城市

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影响,1964年美国学者普恩斯特鲁姆发表了《贫困与进步》,拉开了美国城市史学发展的第一步,他们以城市为研究重心,而深入城市的方方面面,结合人口学、社会学和史学的方法,对于城市建设、城市人口、城市阶层、工业化、社会流动等等作出了合理的史学解释。

日本二战后形成的津田史学,在强调史料作用的同时,也力图以“生活”这一概念把握复杂而矛盾的历史结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于条块问题和杂交优势的思考给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思维,例如,在经济类院校讲革命史时,一些学生提来的问题,可能给历史研究者以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们想知道,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些因素,比如一些中国城市是在哪些因素下成长起来的,经济成分占有多大的比重,他们在形成过程中有支柱产业嘛?政府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和经济学学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多少?

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一般都是以研究一个时代有影响的哲学家、学派为基本脉络的,学者关注的是这些伟大哲人对于那个时代学术的发展给以重视。但是这些学者、学派、甚至宗教对于一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日后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布衣心中留下了什么,社会中的普通百姓要了这种思想的什么则不太重视,由此哲学成了哲学家的哲学,宗教成了和尚、道士、传教士的宗教,实际上社会所呈现给我们的并非如此。

五、一个新时代和史学新方法新模式的建立

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最要注重的一个问题莫过于要想一想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飞跃,将要给我们这一领

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了。

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而信息时代的到来,终于使我们这些从事于过去信息研究的人,要看一看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了。

1980年才刚刚诞生的 INTERNET(交互网络)大型国际分组计算机通信网络已是当今时代全球性计算机通信网络中最成功和覆盖面最大的,尽管这还不是人们所言的信息高速公路,但是它已经将137个国家和地区、220多万个计算机用户、1万多个区域性网络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信息网络。

INTERERT 的出现将改变我们社会的许多东西,将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

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我们可以极为方便地得到信息,包括历史信息,这将使我们免于跑图书馆、档案馆之苦。传统的做卡片、目录学、一生一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必然发生变革。由于电子信箱和其它一些个人或团体网络的建立,可以随时了解你研究领域的情况。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使历史著作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只将文字信息做为多种历史信息的一种,而将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光盘著作将成为历史著作的重要形式,尽管五年以前国人对于多媒体这个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现在它已经开始进入家庭,现在那些给人以象牙塔尖印象的专著,将被多种信息模式改变形象。

50年代,美国科技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出现了一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对历史进行分析研究来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史学流派,这就是计量史学,也叫数值史学。这种史学方法利用计算机准确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存储史料,运用数理统计原理对史料进行分析,再通过各种模型对历史现象和演变进行研究,从而给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计量史学已经在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显

著的成果。从定量分析到定性分析已在经济学界形成潮流,而历史研究也将在这条道路上达到真正科学的更高层次。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历史学出现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为有生命力的,可能就是和数学结合在一起的计量史学,而这一方法将首先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并被人们认可。

六、通俗化和面向未来

在用新的方式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从而使历史研究进一步专业化的同时,历史学将呈现其另一个层面——通俗化。

在过去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专著出版难的同时,大量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普及读物、演义、电视剧、揭秘性读物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文化苦旅》十分畅销,电视剧《唐明皇》、《刘罗锅》走红全国,就连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是总让人觉着有一些历史的影子在里面晃动。

历史学术界对于这些和历史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各种普及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承认的,但是这种普及性的读物和其它各种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普及性历史快餐,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

一本真正好的历史通俗读物,其在社会大众的影响远比高精尖的学术专著要大,《三国演义》人们津津乐道,可《三国志》很多人却毫无所知。历史通俗读物在历史学界的地位应给予确立。因为一般人都知道,科普著作是要由专家来写的,没有对于学问高深的了解,是写不出来好的科普著作的,而且写过科普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那就是写好科普比写一本专著还要难。

伟大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他的高深而在于他的通俗,《史记》就是一例,但是这种通俗是建立在高深的史学基础之上

的。

当然，在强调这一倾向时，我们也反对市场上的一些有关历史的普及读物，单纯地从市场角度出发，在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情况下，写出大量的“揭秘”、“内幕”、“实录”性的东西，对于那些随意编造史料，连历史最起码的标准都不要的东西，应该鸣鼓而攻之。

历史学本身是研究过去，但是却是指向未来的学问。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过去的规律，而这种规律的探索的终极是为了未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我们社会和地球未来越来越关心，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甚至一些关于未来战争的《末日之门》都是书市中的抢手货。

但是之所以知道未来——也就是“所以”，是因为他们知道“因为”，而历史学就是一直在为整个社会的历史找“因为”，也就是说知道了“因为”的历史学家最有权力说“所以”——“未来”。

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说研究历史要“厚今薄古”的原因。

未来学最好的研究人员应该是历史学者，特别是人们所说的“条条”的历史研究的学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美太平洋海战爆发前，一个英国的海战史专家就写出了一本《日美太平洋大海战》，翻一翻书中内容你会以为写的是二战史，而实际上，这本书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发行了，并被大公报译成了中文。

真正的历史学是创造未来的。马克思，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正是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人类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预言，没有历史的研究，很难想像会对未来有什么真正的预言。

历史学应当从厚今薄古，到面向未来。

目 录

视角(代序).....	(1)
-------------	-----

上 编

中法在越南的货币战(1945)	(2)
附录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代金券	(127)
附录二:参考资料	(129)
附录三:相关钱币简表	(132)

中 编

泉书漫议.....	(140)
泉书珍善本.....	(154)
中国钱币目录史料学.....	(173)

下 编

第三只眼看网络金融.....	(318)
浅论中国近代信托事业.....	(330)
后 记.....	(378)

上

编

第一章 中越经济关系简史

一、中越关系简史

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中,最早称越南为“文郎”,这是公元前 258 年以前的事,其后称越南为瓯骆。秦朝,中国略定南方,定其地为象郡。

秦朝末年,原秦国的将领真定人赵陀,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自称国号为南越,占有今天越南北方一部。公元前 202 至 220 年时,汉王朝灭赵氏,将原秦王朝的象郡析为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东汉末时公元 203 年,宪帝又改交趾为交州。此时的交州有今越南的北部和中北部,一直到今天的广治。

唐朝时将这一区域置为安南都护府。

公元 968—980 年越南丁氏平定了十二使君之乱,建立了一个自主的国家,改其国号为大瞿越。李圣宗改为大越。至其英宗时,正是中国宋王朝统治时期,宋王朝承认了安南国。

明王朝时,越南又曾有 20 年被明朝征服。

清朝时,越南一直是中国的属国。

十九世纪初,越南才有了“越南”这一国号。

亚洲各国的近代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亚洲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史,亚洲的大国中国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其它国家基本上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越南也不例外。

近代越南的历史也是和外国传教士的进入密不可分的,由于基督教和亚洲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双方文化的冲突,近代越南政府也曾在越南禁止过基督教的发展,并对传教士进行驱逐,而

西方殖民主义者正是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

1856年,法国军舰侵入越南对一些地区进行炮击。后来法国和西班牙军队又一起以宗教理由对越南进行侵略。至1862年,在外国军队强大的压力之下,越南南方政权与法国代表订立了不平等的条约,规定南国(越南南部)法国和西班牙传教士可以自由来往传教,越南割让领土,自由经商,并进行战争赔款。后来法国占领了越南南圻三省。不久又北上进攻河内,并于1873年攻下河内。

1874年正月二十七日,越南又一次被迫与法国订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法国名义上承认越南独立,同时越南割让南圻领土6省。

越南受法国侵略时,曾向中国求援,但当时中国已自身难保,无法给越南以帮助。但今天越南的一些史学家却伪造材料,说中国想利用这一时机占领越南,真是荒唐。至1883年,法军又一次进攻越南。越南被迫承认其国为法国的保护国,外交由法国人做主。

1883年12月,已经侵占了越南的法国军队4000人,分兵两路对中越边境上的清军发动攻击,取得一些胜利后,便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1884年5月,法国与李鸿章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撤回驻越南的部队,并开放与越南的边境,以便于法国运送物资。

一个月后,当中国军队如何撤离这一技术上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时,法国军队又一次向驻在凉山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反说中国方面破坏了条约,并派海军上将孤拔到中国海疆进行挑衅。

8月,法国舰队在中国基隆被击退,军舰转而来到闽江口,中国大败。福建水师被清廷大员张佩伦和何如璋葬送了,当地百姓云:张无主张,何无奈何。

第二年的春天,老将冯子材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了对法军战斗的巨大胜利,迫使法国内阁下台,但是李鸿章却认为:“当借凉山一